

沙特与黎巴嫩闹“外交危机”的背后

文 / 刘中民 林昕煜

10月26日，黎巴嫩新任新闻部长乔治·库尔达希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称，2015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参与的战争是“荒谬的”，沙特等国军队在战争中“袭击也门人民”，也门胡塞武装在进行“自卫战争”。此番言论迅速引起沙特的强烈不满。10月29日，沙特宣布召回驻黎巴嫩大使，并要求黎巴嫩驻沙特大使在48小时内离境，同时暂停进口黎巴嫩商品。随后，巴林、科威特、阿联酋也陆续宣布召回驻黎巴嫩外交官以“声援”沙特。如此大动干戈，令外界颇感不解。

剑指伊朗？

此番沙特与黎巴嫩关系“急转直下”，其背后根源或为沙特与伊朗在黎巴嫩和也门等国以“教派斗争”为载体的博弈。

根据黎巴嫩的教派分权体制，黎总统、总理和议长分别由基督教马龙派、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伊斯兰教什叶派人士担任，这不仅使黎巴嫩的政治结构变得较为脆弱，也为外部势力的干预创造了条件。比如，沙特长期支持黎巴嫩逊尼派，而伊朗则被认为长期支持黎什叶派力量真主党。



2021年11月2日，黎巴嫩总统奥恩（中）在会见欧洲议会代表团时表示，正在各个层面上努力解决此次与沙特等海湾国家的争端，以便为黎经济复苏营造稳定外部环境。

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发生以来，沙特与伊朗的矛盾不断加剧。伊朗被认为意图“输出革命”，以提供资金、装备与培训的方式支持地区什叶派力量并“扶植代理人”，而黎巴嫩真主党则被认为是伊朗“输出革命”取得的重要成果。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沙特更多通过支持地区内力量抗衡伊朗，但在2015年萨勒曼国王执政后，沙特在对抗伊朗方面更加积极主动，并实施了以“遏制伊朗”为中心的对抗性地区外交，积极构建“反伊朗阵营”，打压阿拉伯国家内部的亲伊朗力量和立场摇摆的政权，以

图瓦解被普遍认为由伊朗领导的“什叶派联盟”。

在此背景下，黎巴嫩逊尼派难敌不断壮大的真主党或为此次沙特“动怒”的根本原因。真主党通过在医疗、教育与福利等领域开展社会服务，参与社会治理，获得黎国内民众认可。与此同时，真主党还通过“反对以色列”获得了不小的声望。2015年5月，黎巴嫩举行了九年来的首次议会选举，真主党及其盟友拿下超过半数议席，政坛地位不断攀升。目前，真主党已经成为黎巴嫩政治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自2011年所谓的“阿

拉伯之春”发生以来，黎巴嫩真主党在中东地区事务上的影响力也不断上升。真主党对埃及、突尼斯等国街头抗议的支持，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支持，对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参与，使其成为中东地区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因此，沙特很可能将被认为是伊朗在黎“代理人”的真主党视为“眼中钉”。就在此次“外交危机”发生后的10月30日，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本·法尔汉在接受采访时否认沙特与黎巴嫩正经历“外交危机”，但却强调真主党在黎巴嫩政治体制中占主导地位是黎陷入危机的原因。黎巴嫩新闻部长乔治·库尔达希被舆论普遍认为与真主党关系密切，其“力挺胡塞武装”的言论或因此“惹恼”沙特。

沙黎关系何以演变至今

回顾历史，沙特与黎巴嫩的早期外交关系因意识形态差异而较为有限。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期，黎巴嫩是自治省，沙特则受奥斯曼帝国的直接统治。奥斯曼帝国解体后，沙特于1932年建立王国，而黎巴嫩则沦为法国的委任统治地。1943年，黎巴嫩正式独立，但直到1952年沙特和黎巴嫩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虽然早在1944年，黎巴嫩首任总统卡米勒·夏蒙便已与时任沙特国王实现互访，但彼时夏蒙领导的亲西方政府与奉行瓦哈比主义的沙

特因意识形态差异接触有限。

20世纪50至60年代，黎巴嫩成为坚持“泛伊斯兰主义”的沙特与奉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埃及在思想领域的“角斗场”。由于黎巴嫩第二任总统福阿德·谢哈卜对埃及采取开放的外交政策，沙特一度疏远了与黎巴嫩的关系。

但随着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的失败，“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逐渐衰败，沙特与黎巴嫩的关系逐渐缓和。战争期间，大量巴勒斯坦难民涌入黎巴嫩。1975年4月13日，黎巴嫩基督教长枪党民兵同穆斯林民兵之间发生武装冲突，导致黎巴嫩内战爆发。黎陷入严重政治危机，

叙利亚等国因此派遣军队军事介入。内战期间，沙特开始扮演黎巴嫩冲突“调停者”，呼吁各派力量保持团结，并向黎派遣维和士兵。与此同时，沙特也成为黎巴嫩人的避难所，在沙特的黎巴嫩人数量由1975年的2.5万人增至1980年代的12.7万人。其间，在沙特积累了大量财富的黎巴嫩逊尼派商人拉菲克·哈里里开始积极参与重建黎巴嫩，同时为黎巴嫩学生提供奖学金前往沙特学习，成为沙特与黎巴嫩的“中间人”。

1989年10月，时任沙特国王法赫德邀请黎巴嫩内战各方前往沙特塔伊夫会谈，并签署了《塔伊夫协议》，重新确立了黎巴嫩的政治权力分配，结束了黎长达



2021年9月16日，伊朗油罐车抵达黎巴嫩，当地民众夹道欢迎。黎巴嫩已陷入严重燃料短缺危机，导致大面积停电。

15年的内战。《塔伊夫协定》的签订是沙特地区外交的胜利成果，此后沙特通过援助和投资开始对黎巴嫩施加影响，并培育了逊尼派力量哈里里家族。1992年，拉菲克·哈里里被推选为黎巴嫩总理。1997年，时任沙特王储阿卜杜拉·阿齐兹访问黎巴嫩，这是自1971年来沙特高级官员对黎巴嫩的首次正式访问。该访问推动了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对黎巴嫩的投资与援助，对黎意义重大。

2005年，时任黎总理拉菲克·哈里里被暗杀，尽管其子萨阿德·哈里里继承了总理职位，但沙特与黎巴嫩的关系已不可同日而语。哈里里被暗杀后，真主党作为被普遍认为由伊朗支持的伊斯兰主义组织，弥补了同年叙利亚军队撤出黎巴嫩后产生的权力真空，沙特和伊朗在黎巴嫩的竞争自此趋于白热化。2005年，阿卜杜拉·阿齐兹上台就任沙特国王，其执政期间沙特继续支持黎巴嫩逊尼派。然而，在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发生后，黎巴嫩真主党对中东地区事务的广泛参与——尤其是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与巴林什叶派反对派的支持，引起了沙特的不满。

此后，随着黎巴嫩真主党的“坐大”与黎逊尼派对领导权的“丧失”，沙特逐渐失去继续支持黎逊尼派的耐心，力图通过各种方式遏制真主党。2013年，沙特曾考虑限制对黎巴嫩工人的签

证发放数量，有分析指出，沙特此举意在防止真主党势力向海湾地区渗透。2016年，沙特还主导阿拉伯国家联盟将真主党定性为“恐怖组织”。同年，尽管黎巴嫩政府的债务已飙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144%，沙特等海湾国家仍开始放缓对黎巴嫩的资金援助。2017年11月，时任黎总理萨阿德·哈里里在访问沙特期间宣布辞职。有分析认为，沙特担心真主党在黎巴嫩“坐大”使得伊朗在黎影响力增强，从而试图通过“逼迫”萨阿德·哈里里辞职来“搅乱”黎政局。但萨阿德·哈里里返黎后，在真主党和基督教人士的支持下撤回了辞职，这或令沙特“更加不悦”。

黎巴嫩“祸不单行”

实际上，在此次“外交危机”发生前，沙特已通过经贸手段表达对黎巴嫩的不满。2021年4月以来，沙特以打击毒品走私为由，禁止从黎巴嫩进口水果和蔬菜，而黎巴嫩与沙特之间的水果蔬菜贸易额每年达2400万美元。此前，沙特一直是黎巴嫩主要的出口对象和援助国。据统计，2019年黎巴嫩对沙特的出口额约为2.82亿美元；1975~2020年间，沙特对黎巴嫩的援助已达2.69亿美元。今年9月，在黎巴嫩宣布提名纳吉布·米卡提为新任总理时，海湾阿拉伯国家也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对黎巴嫩政府表示

祝贺。在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日益疏离黎巴嫩的同时，伊朗与黎巴嫩的联系却在不断增强。例如，2021年9月，为缓解黎巴嫩的燃油紧张，伊朗将400万升柴油运至黎巴嫩。

但尽管如此，黎巴嫩经济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恐将难以改变。自2019年10月以来，黎巴嫩深陷经济和金融危机，货币贬值逾90%。而2020年贝鲁特港大爆炸与新冠疫情的“双重打击”进一步加剧了黎巴嫩的社会危机，导致黎国内教派纷争与民众抗议频发，黎巴嫩甚至还在贝鲁特港大爆炸后进入了长达13个月的政府缺失状态。2021年9月，新成立的黎政府在上任不久便接二连三地面临危机事态。沙特及海湾国家的撤资行为无疑会进一步加剧黎巴嫩的危机。据2021年9月的联合国数据，黎巴嫩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高达四分之三。

总而言之，由于对黎巴嫩真主党势力增强与黎逊尼派“无力回天”的政治格局感到不满，沙特对黎巴嫩陷入了“既无力改变黎政治结构，又对伊朗在黎扩大影响力心有不甘”的矛盾心态。除了以外交和经济手段对黎巴嫩进行打击，沙特“苦无良策”。但如此打击，无疑也会使早已陷入重重危机的黎巴嫩更加脆弱。

（刘中民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林昕煜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